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抗日斗争纪事

■朱姝璇

全国抗战爆发后,面对日军的大举入侵,中国国内形成了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新局面,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此起彼伏、蓬勃兴起。中国共产党利用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地理位置建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广泛团结香港同胞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斗争,为支援祖国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闹市中的联络站

在熙熙攘攘的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2楼,开设着一间经营茶叶批发零售的“粤华公司”。这间位于香港闹市却并不起眼的商铺,就是新组建不久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该办事处的建立,缘于香港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特殊的政治环境。至1937年12月,中国沿海诸港口相继沦陷或被日军封锁,香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渠道和联络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枢纽。同时,由于英国政府对中日战争持中立态度,使得香港成为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必争之地。为了充分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中共中央决定派精通多国语言、富有统战工作经验的廖承志,前往香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负责收集各种情报。12月18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在武汉与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会晤,提出在香港设立办事处等事宜,得到港英当局应允。此时,廖承志几经周折,从汉口抵达香港,以八路军代表身份,同已抵港的原八路军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一起,联手筹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

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遵照周恩来“不公开挂牌”的指示,对外称“粤华公司”,以经营茶叶生意为掩护,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联系香港等中共组织及海外华侨,接受和转运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捐赠的抗日物资,并兼办新四军有关事宜。办事

处严格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运行,机构尽量精简,廖承志任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参与领导,连贯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他们以中共代表的身份频繁往返于武汉、广州、香港之间,积极进行统战工作。20多名工作人员则多以个人的合法职业身份和各自的社会关系为掩护,分别开展各项工作。

同气连枝 团结抗战

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确立的香港为“国际宣传及华侨运动的中心地区”的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伊始,就以香港为阵地,重点开展了对国民党民主人士、在港知名人士及国际友人的统战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与保卫中国同盟联合抗日。

1938年6月,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由具有独特政治地位和享有崇高声望的宋庆龄发起筹建的保卫中国同盟在港正式成立,宋庆龄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任执行委员兼秘书长,直接参与组织工作,其成员不乏中外知名人士,如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国民党著名人士冯玉祥、印度民族革命领袖贾·尼赫鲁、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等。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保卫中国同盟密切配合工作,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为其赢得了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各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同时,许多由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不方便出面处理的事务,也改由保卫中国同盟出面协调办理,突出表现在接收和转运海外捐赠款物,接待和护送华侨青年、国际友人等方面。据统计,保卫中国同盟成立仅一年时间,就从各国为八路军、新四军筹款约25万港币,并筹集了大批部队急需的物资、药品和医疗器械。此外,本着开诚布公、广交朋友统战策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积极指导海外华侨抗日斗争的基础

上,还与著名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赈总会发起人司徒美堂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在在港从事金融业的邓文田、邓文到兄弟进行了统战工作,争取他们从人力、财力上全力支持办事处工作,由此促成了香港各界和海外侨胞团结抗战的全新局面。

海外华侨千里支援

香港沦陷前,香港地区已是中国获取海外援助的重要中转地。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积极工作下,海外华侨不仅踊跃捐款捐物,还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纷纷回国参军参战。

利用香港地理位置接近东南亚地区的优势,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联络海外华侨时,着重开展与东南亚华侨的联络工作,相继创办了《华侨通讯》《华商报》等刊物,积极宣传国内抗战,成为海外华侨尤其是东南亚华侨了解祖国人民抗战的窗口。为加强海外宣传工作,办事处还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派出如郁达夫、胡愈之等著名文化界人士,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地开展工作,密切了与海外华侨的联系。在号召组织海外华侨捐款捐物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仅1938年就以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潘汉年名义3次联名致函海外,呼吁侨胞援助八路军将士,都得到各界热烈响应。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地也积极开展“援八(路军)”“援四(新四军)”运动,成立了“援八援四委员会”,积极筹措财物,所筹款项都由下属各级组织分批秘密汇集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据不完全统计,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的两年半时间,共收到海外华侨汇款220万元和大量物资。

对于获捐物资的运输路径,办事处也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之前,海外援助八路军的物资运送路线是由香港船运经惠州、老隆,陆运至韶关,再转运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广州沦陷后,经广东运输线受阻,便设法在越南海防设立转运站,经海上运到海防,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接收后再转运到各抗日根据地。香港失守后,坚持对日作战的港九大队将收集的英军遗留物资和武器弹药,连同每次战斗中缴获的大部分战利品,源源不断运回内地,并利用香港物资集散地的优势,帮助中共组织和游击队搜集、运送物资。日本投降后,港九大队积极转移武器弹药,就地掩埋或设法运回内地,还将收缴的日军汽车转给当地汽车行,为以后部队活动积蓄了经费。

除汇集捐款、转运物资外,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还动员、输送了大批青年华侨和专业技术人员回国参战,仅1938、1939年两年,通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回国的上述人员就达600余人,其中不少是八路军、新四军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以柯棣华为代表的大批援华医疗

队,经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介绍,跋山涉水到达抗日根据地和抗战前线,为中国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还推动和支持成立了大量回乡服务团,成为香港同胞和海外华侨直接投身祖国抗战的一个重要途径。影响较大的有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香港学赈回国服务团等。各团的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廖承志、潘汉年等经常会见各团负责人,共同商讨抗日计划。

为抗战呐喊

推动并领导香港的抗战文化运动,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卓有成效的工作之一。全国抗战爆发,尤其是上海、广州相继沦陷后,内地一批知名的文化艺术界人士被迫转移到香港,与香港的本土文化人士一起,将香港变为华南地区进步文化的中心。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通过分布在香港文化界、出版界、新闻界的共产党员,“一步一个脚印苦心经营”,共同组织抗日新闻、文化团体,创办抗日报刊,开办进步书店,编演进步戏剧、电影,不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还构筑了香港抗战文化的宣传阵地。除翻印《新华日报》,创办《华侨通讯》和《华商报》外,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还团结了一批进步报刊通讯社,如梁漱溟任社长的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报》,邹韬奋、茅盾任编委的《大众生活》等,并与保卫中国同盟配合,翻印出版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以及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刊物《群众》,在国内外发行销售。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指导和帮助下,一批反映抗战题材的影视剧作品成功推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及香港中国新闻学院也相继成立,培养了180余名抗战急需的新闻工作者。

当国内外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适时利用平台优势积极开展反对投降妥协的斗争,揭露事实真相,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自身形象、维护团结抗战局面的尖兵利器。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国共关系发生倒退,英法美等国以牺牲中国利益与日本达成妥协的“远东慕尼黑”阴谋活动波及香港的复杂情况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积极开展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斗争,进行了对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声讨。同时,一方面派出一批新闻工作者分赴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建立报刊据点或加入当地进步华侨报刊工作;另一方面或通过港和海外各进步报刊报道,或口头向各界人士解释,打破了港英当局和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妥协行径。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印发大量材料,并开展各种社交活动,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在香港爱国人士、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中引起强



1938年6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在香港与保卫中国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宋庆龄及其他委员的合影。右一为廖承志,右四为宋庆龄。

烈反响。随后,鉴于重庆、桂林等地的进步文化人士大部撤至香港,同年5月,廖承志、潘汉年、胡绳、夏衍、张友渔等组成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由此将大量来港进步文化人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使香港成为盛极一时、影响深远的抗战文化宣传阵地。

筹建华南抗日武装

日军侵占广州后,华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实施阶段。在这一紧要关头,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积极协助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建立和发展华南人民抗日武装,相继建立起东江、珠江、琼崖等地区抗日根据地,有力地促进了华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

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的指示,廖承志立即召集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曾生、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等在香港召开会议,决定组成惠阳工作团,带领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60余人,到惠阳组织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工作团一行人抵达惠阳后,成立了中共惠工委,并组建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此期间,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中共香港地方组织还从香港动员了一批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赴惠阳参军参战,其中一部分直接加入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为筹建珠江地区的抗日武装,早在1938年春,廖承志在香港就多次动员大革命时期佛山、南海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吴勤回乡组建抗日武装。广州沦陷后,吴勤在中共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帮助下,在广州南郊组建了抗日义勇队,随后被编为广州市区游击第2支队(简称广游2支队)。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还十分关注以红军改编为焦点的琼崖国共两党谈判,曾反复去电及协同中共广东省委派人前往指导谈判,强调要坚持红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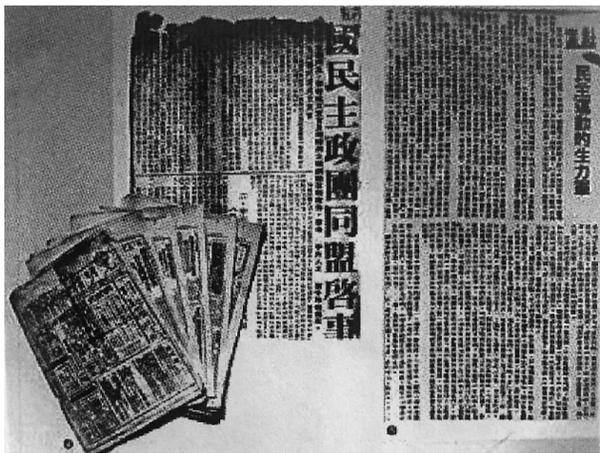
政治上组织上独立自主的原则。在中共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协助下,琼崖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12月5日,正式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简称琼崖独立队,后扩编为琼崖独立总队)。

为了促进华南抗日武装的迅速发展,廖承志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还多次分别或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请求延安派有作战经验的粤籍干部回广东工作,并组织大批爱国华侨青年和专业技术人员回乡支持抗战。同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还克服重重困难,帮助华南抗日武装筹措钱款物资,使部队的给养和经费有了一定的保障。1939年初,国外华侨寄给宋庆龄并经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转交给曾生部队的款项,一次就达港币20万元。

1940年1月后,根据中共中央“琼崖要有三部电台,并以一部与中央联络”的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设法购置了一部75瓦的接收发报机,于8月送至琼崖独立总队,保证了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独立总队与中共中央的及时联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香港。中共中央及南方局、周恩来紧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抗日游击队负责人,营救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这次营救活动历时半年多,共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部分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家属等800多人。这一壮举蜚声海外,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1942年1月,廖承志和办事处工作人员逐次撤离香港返回内陆;2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宣告结束。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先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充分利用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地理位置,挺身而出肩负香港抗战的重任,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工作,为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香港当时出版的部分抗战报刊。

轻轻推开那扇红色拱门,沿楼梯望去,一本本厚重的书籍,一张张泛黄的纸页安静地躺在木格中。

在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史馆中有一座“红书阁”,安放这支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和领导的西北红军部队连亘88载的光辉记忆。

红书阁上下共4层,于2019年11月建成。虽建成时间不长,但其中存放着涵盖红军自1932年创立之初至今的各类档案、资料、人物传记、历史纪实等多达5400余册。

报纸上获悉陕甘红军存在:毛主席提出到陕北去

1932年燎原星火燃遍陕甘,诞生了这个红军师最早的前身部队: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

3年时间里,部队逐步发展壮大,开辟了陕甘革命根据地。而当时中央红军正面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全国各根据地相继丧失,陕甘苏区成为“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1935年9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甘肃南部哈达铺镇。一天,几位中央领导兴趣颇高地翻阅着1纵队侦察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等人搜集到的许多国民党统治区域出版发行的近期报纸杂志。其中有天津出版发行的《大公报》、山西出版发行的《晋阳日报》等。毛泽东

从这些报刊上获悉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随后的一次会议中毛泽东讲道,我们要感谢国民党的报纸,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信息……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9月18日,红26军、红27军与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合编为红15军团,红25、红26、红27军依次改编为第75、第78、第81师。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前身部队正是第81师,他们连续攻城拔寨,为迎接党中央扫清前进障碍。

9月23日,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1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10月19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陕甘支队胜利到达吴起镇。官兵听到党中央到达陕北的消息纷纷奔走相告,刘志丹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事情就好办了!”11月初,红15军团与陕甘支队在甘泉下寺湾会师,从此隶属红一方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指挥下战斗。

后来,官兵听说是国民党的报纸为毛主席把长征“落脚点”选在陕北提供了

重要参考,便专门搜集了几份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域出版发行的《大公报》。时光流转,有几份《大公报》连同其电子图片一并被保存在红书阁。

《好事集》见证抗美援朝 荣光:高炮连打出辉煌战绩

在红书阁中,留存着一册志愿军独立高炮第11营2连(现红军师某火力团高炮营1连)战士手写的《好事集》。这本《好事集》也是一册战斗笔记。

这个连队是志愿军第二批入朝的高炮部队,参加大小战斗百余次,牺牲了两名战友,共击落敌机30架,击伤27架。炮三班因创造单炮击落10架敌机的辉煌战绩,被志愿军总部授予“十颗红星炮班”荣誉称号,而这门炮至今仍保存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

是一群怎样的战士,能打出这样的战绩?

这个高炮连的战士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但他们只经过21天的突击训练,就带着苏制单管37mm高炮奔赴战场。

他们的对手是美国空军,曾击败了防空炮口径动辄88mm、105mm、128mm的巨兽,而今又装备了大量喷气式飞机,嚣张跋扈、不可一世。

“战士们不信邪,带着‘人在炮在,有炮弹就要和敌机拼!只要你炸不死我,我就要把你打下来!’的战斗宣言毅然走上战场。一次战斗中,炮手罗永胜牺牲了,二排长王兆祥拖下战友的尸体,操起火炮。在和敌机对射中,二排长的肠子被打了出来,他仍操作火炮进行射击……

在掩护阳德车站战斗中,他们连续作战9小时,火炮身管更换多次,击落敌机6架,击伤7架,活捉美军飞行员3名,一举打出志愿军高炮部队的威风。

官兵在《好事集》中,把每一次战斗经历都记录下来,不仅总结出了“用单炮打游击战、打伏击战”等战法,也为后人

留下宝贵资料,激励一代代官兵永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军战史》谱写红军部队 壮歌:跨越37年最终写成

1950年,红军师按照上级指示精神,曾先后4次组织人员编写军战史,但由于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部队在临夏、甘南、西藏等地区连年行军作战,使得军战史编撰工作几经耽搁。

直到1983年3月,红军师党委再次抽调人员成立师军战史编写组,编撰工作才正式重启。

而这时距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已经过去50多年,加上部队几经合并整编,足迹走遍9个省区,参加大小战役战斗2660余次,使得编撰工作难度极大。

1987年3月,第一版红军师《军战史》终于面世。序言中写道:“许多宝贵资料在战争年代失散了,成为历史的遗憾;创造历史的不少老同志已经

‘走’了……”

1988年12月,该师被原兰州军区确定为红军师。时至今日,红军师官兵学习历史的同时仍在不断发掘历史。2017年以来,红军师连续三年组织“寻(遗址)访(老兵)集(文物)”活动,继续追寻红军师历史。

他们找到了谢子长1930年春季在国民党新11旅秘密开展兵运活动时向党组织汇报工作的信笺,刘志丹1935年11月陕北苏区错误“肃反”后在平反会上的讲话记录、习仲勋1947年3月在青化砭战役中签署的命令文件……

这些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珍贵史料,历经炮火硝烟,辗转万水千山,成为红军师凝聚军心、教育部队、培育血性的宝贵精神财富。

如今再翻看这些尘封的纸页,历史便不再是躺在柜台中的冰冷文物,不再是挂在墙上的模糊照片,而是一个个平凡的名字,一段段真实的故事,一句句朴实的话语,新时代官兵由此得以穿越时空与前辈对话,从文字中间收获更多的震撼与感动。



第4890期